



# 坚持长期主义 是因应市场竞争的定海神针

## 阅读提要

■ 真正的长期主义,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有明确的长远目标,二是坚定不移地推进这一目标。

■ 坚持长期主义,不是一成不变、按部就班,而是在坚持长远目标不变的情况下,结合企业实际情况,创新求变、创新求进。

■ 坚持长期主义是因应市场竞争的定海神针,也是企业“不畏浮云遮望眼”,确立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路径的最大底气。

□ 贾钢涛

坚定不移把制造业和实体经济做强做优做大,加快从制造大国迈向制造强国的步伐,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

长期主义作为经济学概念而盛行于世,本意是强调投资要着眼于长期利益而非短期回报。真正的长期主义,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有明确的长远目标,二是坚定不移地推进这一目标。

从1924年名不见经传的“永巨”小作坊起步,到1955年“永巨”与另外两家企业合并为公私合营企业;从1994

要求。

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来到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了解山西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推动高质量发展等情况。总书记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

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阳阀作为中国制造业特别是“专精特新”企业的行业翘楚,其百年发展历程可谓坚持长期主义的生动缩影,彰显出百年老店在技术迭代、市

场变动与转型升级中的韧性力量。这种蕴含以技术创新为引领、市场需要为导向以及科学管理为保证的长期主义,最终随着时间的沉淀转化为企业转型升级的精神特质。

## 真正的长期主义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年改制为国有控股股份公司,到新时代踔厉奋发,出口额占全年产值1/3……百年来,阳阀始终专注于阀门这一主业,一直坚持做好阀门这一拳头产品,书写了中国传统制造业“强起来”的壮美篇章。

跨越百年时空的阳阀历久弥新,无论在风雨如晦的旧中国,还是百废待兴

的新中国,无论是激情燃烧的革命岁月,还是创新进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一代又一代的阳阀人始终坚持长期主义,始终奉行质量为上、客户为本,走出了第一条不断创新、追求卓越的企业发展之路,将一个小作坊发展为今天的行业领军企业。纵观阳阀的百年发展史,既有初创时期矢志工业报国的一片初

心,也有和平年代“护航大国重器运转”的历史荣光;既有应对产业迭代浪潮中的技术革新阵痛,也有奋进新时代加快推动产业调整、“退城入园”的浴火重生,充分体现出其“自强自信、改革创新、做大做强、与时俱进”的企业精神,生动诠释了中国制造业逆风前行、披荆斩棘、敢于胜利的强大韧性。

## 坚持长期主义并非一成不变、按部就班

坚持以自主创新为先导,厚植企业发展新动能。科技创新是产业发展的源动力,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制造业从“造不了”到“造得出”再到“造得好”的背后,离不开企业的自主创新。有的作为全球民用无人机领域的巨擘,在研发投入方面不惜重金,拥有多项核心技术,领先国内外同行。有的无惧西方技术打压,以“干就完了”的巨大魄力推动自主创新,硬是杀出一条血路,以铁的事实说明了西方世界“小院高墙”根本挡不住中国科技企业创新发展的强劲步伐。这种注重自主创新的长期主义,既避免了技术断代风险,也为技术创新与市场拓展的同频共振提供了必要前提。

坚持以品牌塑造为关键,支撑企业拓展新市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品牌

建设,强调“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品牌是企业的灵魂,是企业的无形资产。科技自立自强促进品牌打造,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中,自主品牌比重达32.4%,较去年同期提升了1.2个百分点。质量过硬、智能绿色的中国家电继续畅销海外市场,一批新能源汽车品牌加速出海,在许多国家“圈粉”无数。越来越多的企业紧跟国际市场需求变化,加大产业链条建设,针对不同国家提供差异化、定制化产品。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在国际市场的风浪中经受洗礼、成长壮大,成为担纲我国出口增长的主力军。

坚持以科学管理为抓手,提升企业文化软实力。新时代以来中国制造业自强不息、勇攀高峰的发展历程,就是中国企业在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方向,不断

完善企业治理、弘扬企业家精神、注重改革创新的过程。那些名企的成功既有强化战略管理,将企业发展与要素有机整合,防止盲目多元化扩张的先见,又有注重内部管理、减少管理层级、提升管理效率的硬招,既有注重防范、化解风险的内嵌机制,又有注重人文关怀、强化精神激励的企业温度。可以说,中国制造之所以能创新驱动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矢志攻坚造就大国重器,自立自强攻克关键技术,锐意转型发展新兴产业,关键是充分调动了企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充分激发了企业的内生动力,充分展示了企业的文化软实力。从个别企业涅槃腾飞到中国制造整体发力,从建设制造大国迈向建设制造强国,这是中国经济坚持高质量发展的结果,是中国制造积极推动增量式变革、坚持长期主义的结果。

## 坚持长期主义要审度时宜、虑定而动

志创新,不断提升中国制造业的整体水平。这种长期主义发展模式,审度时宜,虑定而动,既有宏观战略层面的擘画,又有实践探索层面的托举,既注重顶层设计的前瞻性,又确保具体举措接得住,从而做到以企业自身的确定性应对市场的不确定性。

加大自主创新,聚力企业转型升级的硬核力量。办好企业必须要有拳头产品,这是企业安身立命的根本。要把企业的优良传统发扬光大、要让优秀产品占领市场,必须坚持既不能丢掉企业的看家本领,又要瞄准市场做科研,不断提升产品科技含量,持续优化产品结构,推动中国制造向新向智发展。只有坚持不断创新,不断满足市场需要,方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掌握主动、抢占先机。建设制造强国,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在自主创新中壮大中国制造的筋骨,在传承发展中赓续中国制造的荣光,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加高端产品供给,推动企业转型升级,分级打造中国制造名品方阵,推动供给和需求良性互动,为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迈进作出应有的贡献。

注重精神传承,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强力担当。坚持长期主义,不是简单地“坚持”,而是遵循企业发展规律、顺应市场变化规律的创新应变,是企业主体发挥历史主动精神、履行社会责任的战略擘画。

一个不注重科技创新的企业做不大,一个不注重品牌提升的企业做不久,一个不注重文化传承的企业做不强,加强企业

文化建设、厚实企业文化底蕴至关重要。既要保证企业有合理的利润空间,又要保障员工收入稳定增长,难不难?既要支撑产业转型升级,又要培育新质生产力,难不难?既要满足国内市场需要,又要应对国际市场竞争,难不难?很显然,都不容易,但又必须要做。以长期主义做这些难而正确的事,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激发人民的历史主动精神,用先进标准体系倒逼质量提升、产品升级、品牌打造,统筹好改革牵引、自主创新和人才延揽的叠加效应,培育更富活力、更具韧性、更有竞争力的现代企业,真正把企业做强做优做大。

(作者为北京化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 数字治理应走出“技术至上”误区

□ 翁俊芳

在数字化浪潮席卷之下,数字治理成为提升社会治理效能、推动公共服务创新的关键路径。然而,在数字治理的实践与发展中,也暴露出诸多问题。深入剖析数字治理中“技术至上”的现实表现,挖掘其根本原因,并探索走出误区的有效路径,对推动数字治理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 “技术至上”的现实表现

过度依赖技术工具,忽视治理本质需求的根源在于对技术工具理性的过度推崇。工具理性强调通过精确计算和技术手段实现目标,在数字治理领域,这种思维使得治理主体将技术视为解决一切问题的万能钥匙,片面追求技术的高效性和精确性,而忽视了治理的价值理性。当前对技术工具理性的过度追从,使得治理主体在实践中本末倒置,将技术手段作为治理的核心,而将真正的治理需求置于次要地位,导致数字治理偏离正确方向。

不同层级部门的利益驱动导致数字治理体系封闭化,阻碍治理协同与共享。不同部门、机构之间的技术系统各自为政,数据标准不统一,信息共享机制缺失,形成“数据孤岛”和“技术烟囱”。一些地方的数字治理平台为了追求技术的先进性与独特性,采用了封闭的技术架构与私有协议,使得第三方机构和社会力量难以参与数字治理,限制了数字治理总体的开放性和多元性。这种情况导致数字治理缺乏社会协同,无法充分发挥社会各方的智慧和力量,难以形成有效的治理合力。

技术应用忽视人文关怀,缺乏治理温

度。随着数字技术在公共服务领域的广泛应用,一些老年人、残障人士等特殊群体由于缺乏数字技能和与时俱进的数字化设备,难以享受到便捷的数字服务。一些基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治理决策系统,由于算法设计不合理或数据偏差,可能会对某些群体产生不公平对待。

## 根本原因是手段与目的颠倒

过度依赖技术工具、忽视治理本质需求的根源在于对技术工具理性的过度推崇。工具理性强调通过精确计算和技术手段实现目标,在数字治理领域,这种思维使得治理主体将技术视为解决一切问题的万能钥匙,片面追求技术的高效性和精确性,而忽视了治理的价值理性。当前对技术工具理性的过度追从,使得治理主体在实践中本末倒置,将技术手段作为治理的核心,而将真正的治理需求置于次要地位,导致数字治理偏离正确方向。

不同层级部门的利益驱动导致数字治理体系封闭化,阻碍治理协同与共享。在现行治理体制下,少数部门为维护自身利益,倾向于建立独立的技术系统,掌握数据资源的控制权,以获取更多的话语权和资源分配权。同时,由于缺乏统一的数据标准、信息共享机制和协调管理机构,部门之间难以实现技术系统的协同与数据共享。部门利益的藩篱与制度的缺失相互作用,使得技术系统封闭化问题日益严重,阻碍了数字治理的整体推进。

在数字治理过程中,缺乏以人为本的价值导向是导致技术应用忽视人文关怀、加剧

社会不平等的症结所在。在“技术至上”的思维模式下,治理主体过于关注技术的功能实现和效率提升,将人视为技术应用的对象和数据来源,而忽视了人的主体性和多样性需求。这种对人文价值的漠视,导致数字治理在追求技术进步的过程中,偏离了保障公民权益、促进社会公平的轨道。当前人文价值理念在数字治理中的缺失,使得技术应用未能充分考虑不同群体的特殊需求和利益诉求,有违社会公平正义和人文关怀的目标。

## 从“技术导向”向“需求导向”的转变

重构治理逻辑,明确技术工具的定位。治理主体应树立正确的数字治理观,将满足人民需求、实现公共利益作为数字治理的根本目标,将技术视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和工具。在引入和应用技术时,要充分进行需求分析和可行性研究,确保技术手段与治理目标相契合。此外,还应加强对治理主体的教育和培训,提升其数字治理素养和价值判断能力,使其能够正确认识技术与治理的关系,避免陷入“技术崇拜”。通过建立科学的绩效评估体系,将治理效果、公众满意度等纳入考核指标,对数字治理项目的实施效果进行全面、客观的评估,及时调整和优化技术应用策略,避免盲目追求技术的先进性而忽视实际效果。引导治理主体关注治理本质,实现从“技术导向”向“需求导向”的转变。

打破部门利益壁垒,建立有效的协同机制。政府应加强顶层设计,在差异化基础上制定有机统一的数字治理规划和标准,明确

各部门在数字治理中的职责和权限,促进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可以通过建立并完善跨部门的数据共享平台等方式,加强部门之间的沟通与协作,消除数据壁垒和技术障碍。同时,通过建立健全法律法规和监管制度,明确数据权属、使用规则和安全责任,保障数据共享的合法性和安全性。建立健全激励机制,对在数字治理协同与共享方面表现突出的部门和个人给予奖励,对阻碍协同与共享的行为进行约束。此外,可引入市场机制和社会力量,鼓励企业和社会组织参与数字治理系统的建设和运营,通过合作共贏的方式促进技术的协同与共享,提高数字治理的整体效能。

坚持以人为本,强化数字治理中的人文关怀。政府在推进数字治理时,要充分考虑不同群体的需求和能力,采取差异化的政策和措施,缩小数字鸿沟,保障社会公平。例如,针对老年人、残障人士等特殊群体,可以开发适老化、简化、无障碍的数字服务产品,提供线下培训与辅助服务,帮助他们跨越数字障碍,享受数字治理带来的便利。同时,加强数据隐私保护和算法监管,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和伦理准则,防止算法歧视和数据滥用,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此外,还应加强数字素养教育,提高全体公民的数字技能和信息安全意识,促进数字社会的公平、包容发展,使数字治理成果能够惠及全体人民。未来,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治理实践的深入推进,还需持续关注数字治理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挑战,不断探索创新,推动数字治理理论和实践高质量发展。

(作者单位: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 梅杰

如何定义、定位黄梅戏,涉及对黄梅戏历史和剧种归属问题的研究,这是一个学术问题。搞清楚这个问题,有助于搞清楚历史,更好地发展黄梅戏。

黄梅戏原为湖北剧种,从湖北黄梅传入安徽、江西等省以后,成为跨省剧种,但在安徽改以后,从湖北剧种逐渐被描述成安徽剧种,由此产生了黄梅戏起源与剧种归属之争的文化现象。

关于黄梅戏历史和剧种归属问题主要形成了以下两种观点:

第一,黄梅戏起源、初步形成于湖北黄梅,发展壮大于安徽,原是湖北剧种,后来成为跨省剧种。这种说法认为黄梅采茶戏是早期的黄梅戏,在湖北黄梅已经形成戏曲,只是在安徽得以完善、定型。1949年后,作为个入学说,最早可能见于安徽学者张紫1951年发表的《黄梅戏的初步调查》中指出的“安徽黄梅调来自湖北黄梅戏……黄梅调最初的三十六大本戏,就是湖北黄梅戏的原来脚本”。作为官方说法,可能较早见于文化部1962年公布的《全国戏曲剧种名录及流行情况》,在湖北剧种名下,明确提到“黄梅采茶戏即黄梅戏,在湖北称西路子腔,在安徽称东路子腔”;在安徽黄梅戏名下,明确提到“起源于湖北黄梅”,流布区域包括安徽合肥、六安、安庆、芜湖、湖北黄冈、江西九江等地。这一处理,说明在当时并未将黄梅戏视为限定在某省某市的剧种,而是横贯鄂皖赣的跨省剧种。湖北的各类出版物大体如此表述,如《荆楚文化史》明确提到黄梅戏最初叫黄梅采茶戏,形成于黄梅、广济一带。这个学说,丰富了黄梅戏起源的历史文化内涵,明确指出黄梅戏的传统经典剧目,如蔡明凤小辞店、张德和大辞店,胡彦昌中辞店以及《老四》系列等,均来自湖北黄梅,它们主要是黄梅真人真事基础上完成的。该学说同时主张黄梅戏的传统唱腔主要在湖北黄梅形成,然后在安徽演变、发展。三大辞店以及《老四》系列等,在传统黄梅戏中的地位类似于今天的《天仙配》《女驸马》《罗帕记》,将它们明确出自湖北黄梅,突出了湖北黄梅在黄梅戏起源和形成的历史中的核心地位,让黄梅戏得名于湖北黄梅实至名归。

第二,黄梅戏起源于湖北黄梅,发展壮大于安徽,是安徽剧种。主要由安徽学者陆洪非提出,再由王长安予以深化。但是,这个学说还未明确地告诉世人哪些剧本、唱腔来自湖北黄梅,容易让人误会成湖北黄梅只是贡献了采茶小调。

以上两种观点,都认为黄梅戏因起源于湖北黄梅而得名,只是在黄梅戏的形成中,对于湖北黄梅和安徽安庆各自的贡献的认识有一定出入。近年来,有一种不同的声音认为,黄梅戏起源、形成、发展壮大于安徽安庆,是安庆的“源发”地方戏。这种学说见于2018年《黄梅戏起源》《中国戏曲剧种研究》等。其具体内容又包括安庆黄梅雨季说、安庆黄梅山说,以及最近出现的“安庆码头说”;就安庆内部而言,又有宿松说、太湖说、怀宁说、望江说等争端,主要见于安庆《黄梅戏艺术》。这种千变万化的学说,自2018年以来一直在向安徽甚至全国推广,引发社会公众的广泛讨论。该学说突出了黄梅戏在安庆的初步发展和变化,比如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融入个别安庆方言、民间艺术以及唱腔改革、胡琴伴奏的尝试。同时,我们也应知道,1953年演出《天仙配》以来的现代黄梅戏,并非出自安庆。在戏改以后,安庆艺人也要改唱现代黄梅戏,甚至大量安庆艺人和群众有强烈的抵触和畏难情绪。在安庆形成的是黄梅采茶戏的支派,也就是所谓的“怀腔”,并不等同于现代黄梅戏。标志着黄梅戏发展壮大的梅开一度、梅开二度,都是由位于合肥的安徽省黄梅戏剧院主导的。王兆乾等学者甚至指出,在解放前夕,安庆黄梅戏濒临灭绝,除了丁永泉戏班外,其发展水平整体处于黄梅采茶戏的三打七唱阶段,并未高出湖北黄梅(民国时期的安庆、黄梅两地艺人还组班合唱),所谓“怀腔”使用胡琴伴奏只是个例。

在新时代,对于黄梅戏历史与剧种归属问题的研究,应该立足于大数据文献,从湖北、安徽以外的第三方视角重新审视这一问题。《黄梅戏源流考辨》梳理了一百多条清代民国第三方记载的黄梅戏历史文献,我们清楚地发现:黄梅戏起源、形成于湖北黄梅,本是湖北剧种,流入各省后成为跨省剧种,而民国时期的安庆并非戏码头,在安徽戏改成功后黄梅戏才被描述成安徽剧种。

1885年3月21日(光绪十一年二月初五日),《申报》发表《淫戏宜禁》,提到“迩来芜湖到有湖北戏班,专唱黄梅调淫剧”。

1918年5月,《时报》《时事新报》《民国日报》发表《演唱黄梅调之武剧》等,证明湖北戏班已进入上海九亩地戏楼演出黄梅戏,比安徽艺人进入上海早了十五年以上。而关于安庆艺人进入上海演出,被现在的学者说成黄梅戏发展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优美的黄梅调让上海人足足过了一把瘾”之类,都是想象,早期史料显示:“艺人为糊口,临时结班,跑到上海进行地摊演出,观众多是皖西一带在上海谋生的老乡,并不被人重视,没有什么影响”(郑立松语)。

1935年8月31日,《北洋画报》第1290期“戏剧专刊”发表文雨文《谈“黄梅腔”》,称:“黄梅腔为南方流行杂戏之一,起源于湖北之黄梅县,因以为名。现渐普遍及于赣皖各地。大都会虽不常见,但常出演于各县之乡镇中。”

有学者指出:“从上面的引述中,我们未必能窥见历史全貌,但历史记载隐含的历史事件的重复出现用一句‘巧合’是不能说明问题的。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历史的重复有其内在的必然性和规律性,上述历史记载的内在必然性和规律性只能用一种判断才可能触摸到历史的真相:黄梅采茶戏起源并部分成长于湖北黄梅县,兴盛发达于其他周边省份不过是历史发展的后来之事了。”而黄梅戏起源和形成于安庆明显缺少文献记载,蔡仲贤、丁永泉等安徽黄梅戏祖师爷、奠基人异口同声指出黄梅戏来自湖北黄梅,这些原始说法一定藏有着历史真相和朴素的主观真理。

作为一个剧种,对黄梅戏的描述,宜远离地域本位,破除湖北与安徽的二元对立,回归艺术发展史的本身。艺术无国界,何况市之界?今后对黄梅戏的研究,应该平衡历史真实与地方利益,按照客观历史事实秉笔直书。黄梅戏不是哪一个省、哪一个市的,黄梅、安庆、合肥等地都不能拥有全部的黄梅戏历史和贡献,应该站在“大黄梅”的视角之下,从中国出发,来看待黄梅戏这一剧种,实现多省共同书写中国黄梅戏通史,共推黄梅戏的艺术传承与发展。

(作者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生导师、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副编审、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站在“大黄梅”的视角看待黄梅戏